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 国 现 代 出 版 家 论 著 丛 书

主编 郝振省

隔膜

叶圣陶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主编

郝振省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隔膜

叶圣陶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隔膜 / 叶圣陶著.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3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 郝振省主编)

ISBN 978-7-5604-4325-6

I. ①隔… II. ①叶… III. ①短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8004号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隔膜

叶圣陶 著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邮 箱: 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3.875

字 数: 87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325-6

定 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西北大学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29-883029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责任编辑 马平
装帧设计 谢晶

作者简介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1916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执教，推出第一个童话故事《稻草人》。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1923年，发表长篇小说《倪焕之》。

1949年后，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主席。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8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编辑说明

叶圣陶是当代著名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20世纪一二十年代发表了许多白话小说，文风质朴，词语简明，影响很大。《隔膜》就是他192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这次整理重版，改原版竖排繁体字为横排简体字，改正了异体字、俗体字等，核改了一些错讹文字，在不影响文意的前提下，依现今规范替换了文中一些字词，以方便今天读者的阅读。

总 序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选集张元济等中国现代出版拓荒者14人之代表性作品19部，展示他们为中国现代出版奠基所作出的拓荒性成就和贡献。这套书由策划到编辑出版已有近六个年头了，遴选搜寻作品颇费周折，繁简转化及符合现今阅读习惯之编辑加工亦费时较多。经过多方努力，现在终于要问世了，作为该书的主编，我确实有责任用心地写几句话，对作者、编者和读者有个交代。尽管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并不是特别有话语权。

首先想要交代的是这套选集编辑出版的背景是什么，必要性在哪里？很可能不少读者朋友，看到这些论著者的名字：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钱君匋、邹韬奋、叶圣陶等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又在“炒冷饭”，又在“朝三暮四”或者“朝四暮三”？如此而然，对作者则是一种失敬，对读者则完全是一种损失，就会让笔者为编者感到羞愧。而事情恰恰相反，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们用心是良苦的，选编的角度是精准的，是很注意“供给侧改革”的。就实际生活而言，对待任何事物，怕的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怕的就是浮光掠

影，道听途说；怕的就是想当然，而不尽然。对待出版物亦是这样，更是这样。确实不少整理性出版物、资料性出版物，属于少投入、多产出的克隆性出版；属于既保险、又赚线的懒人哲学？而这套论著确有它独到的价值。论著者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只读圣贤书”的出版家，而是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焦急民族发展困境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着国家的积贫积弱，民众的一盘散沙，生活的饥寒交迫，列强的大举入侵，和“道德人心”的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不能拯救中国的危局，在西学东渐，重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固守着民族优秀文化的品格，秉承“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使命，整理国故，传承经典，评介新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出版文化事业进行了拓荒性奠基。如果再往历史的深层追溯，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代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胸与志向的使命追求，正如北宋思想家张载所倡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为中华民族这些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思想家们肃然起敬。以张元济等为代表的民国进步出版家们，作为现代出版文化的拓荒奠基者，其实就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思想大家、文化大家。挖掘、整理、选萃他们的出版文化思想，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之举，也是为新时代实现古今会通、中西结合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的必须之举。

不仅如此，这套论著丛书的出版价值还在于作者是民国时期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群体，一批立足于出版的文化大家和思想大家；14位民国出版家的19部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未曾出版，具有重要的填补史料空白的性

质，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耕耘者都是一笔十分重要的文化财富之集聚。通过对拓荒和奠基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这些出版家部分重要作品的刊布，让我们了解这些出版家所特有的文化理念、文化视野、人文情怀，反思现在出版人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而忘记出版人的文化使命与精神追求等等现象。

之所以愿意出任该套论著丛书的主编还有一层考虑在里面。这些现代出版事业拓荒奠基的出版家们，其实也是一批彪炳于史册的编辑名家与编辑大家。他们几乎都有编辑方面的极深造诣与杰出成就。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会长，也特别想从中寻觅和探究一位伟大的编辑家，他的作派应该怎样的一种风格。张元济先生的《校史随笔》其实就是他编辑史学图书的原态轨迹；王云五的《新目录学的一角落》其实就是编辑工作的一方面集大成之结果；邹韬奋的《经历》中，就包含着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心血智慧；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也不乏他的编辑职业之体验；陆费逵的《教育文存》、章锡琛的《〈文史通义〉选注》、周振甫的《诗词例话》等都有着他们作为一代编辑家的风采与灼见；赵家璧的三部论著中有两部干脆就是讲编辑故事的，一部是《编辑忆旧》，一部是《编辑生涯忆鲁迅》，其实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只要你能认真地读进去，你就会发现一位职业编辑做到极致就会成为一位学者或名家，进而成为大思想家、大文化家，编辑最有条件成为思想家、文化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就看识月不识月”。我们的编辑同仁难道不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编辑职业的神圣性而感到由衷的自豪与骄傲吗？

这套丛书真正读进去的话，容易使人联想到正是这一批民国时期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现代出版文化的

开创者与建树者，为西学东渐，为文明传承，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们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努力，他们所举办的现代书、报、刊社及其载体实际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输的重要通道，成为中西文化发展交融的重要枢纽，成为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和探究救国、救民真理的重要精神园地。甚至现代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出版文化的初步形成，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诞生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就是在他们旗下的出版企业担任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的还是他们所在出版单位的作者或签约作者。更多的早期共产党人正是受到他们的感染和影响，出书、办报、办刊而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民国出版家及其拓荒性论著的价值重视还很不够。而这套论著丛书恰恰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所补救，我们为什么不认真一读呢？

是为序。

郝振省

2018.3.20

序

顾颉刚

圣陶集了几年来作的小说二十篇，付文学会刊入丛书，教我作一篇序。我与圣陶是最早的同学，他的思想与艺术，十分之七八，我都看见晓得。我虽则没做过文艺的研究，不能说明他的小说在文艺界上的地位，可是要作一篇序来说明他的思想的本质，与他所以作小说的背景，自以为我是最适宜了。

圣陶小时候，与我住在同巷。二十世纪的第一年，我九岁，他八岁，我们就在一处私塾读书。那时的情形，我现在已想不大起；只记得圣陶颇欢喜做些玩物，背着先生戏弄。他同我说的话，还记得一句：他说，“我会把象牙做朝版，你要我做吗？”象牙朝版他当然没有做过；但他看见了道士手里握的一块，便兴起了自己创作的念头，这是可信的。

他比我早进一年中学。我进中学时，他正是刻图章，写篆字最有兴味的当儿。记得那时看见他手里拿的一把大折扇，扇上写满了许多小小的篆字，我看了他的匀净工整，觉得很羡慕。后来他极欢喜作诗。当时同学里差不多没有一个会作诗的，他屡屡的教导我们，于是中学校里就结合了一个诗

会，叫做“放社”。但别人的想象和表出，总不能像他那般的深细，做出来的东西总是直率得很，所以我们甘心推他做盟主。

他毕业后写给我的信，屡次把诗词来替代，开缄时往往只见一首长诗，或四五首的律诗。他的诗并不雕琢字面，也不堆砌典故，也不模仿哪一家，只是活泼泼的表情写景。现在就掇拾的方便，录出一首。

游拙政园

纤雨值休辰，园游恣幽赏。
 迴沼抱南轩，几窗爱净朗。
 小坐神忽清，喻之言难想。
 环顾卉树森，浓绿弥众象。
 稀处现楼台，微风动帘幌。
 一声鹧鸪啼，忽焉聆繁响：
 乃如蟹爬沙，雨急敲林莽。
 此境益静寂，空山或可仿。
 颇公燕都归，听雨谈抵掌：
 直北是长安，冠盖属朋党。
 白日妖霾现，杀人弃沟壤。
 鸡鸣上客尊，狗苟公道枉。
 豪游金买笑，乞怜血殷颡。
 嗟哉行路难，触处是肮脏。
 何当谢世虑，摄心息俯仰？
 寄情孰所乐，高歌慨以慷！
 帝力鼓大化，谁省我所往？
 辞终各无言，看水倚轩幌：

初荷碧玉盘，水珠滚三两。

（民国二年七月二日）

圣陶对于文艺，没有一种不欢喜。他常要学雕刻，可怜这件事在中国是没有一点机会的，至今只落得一个想望。又常想看戏做戏，但苏州既没有机会，上海又没有力量去。元年九月，我到上海，看了戏告他；他答我道：

“此事余并无阅历，而自信有理想上之境界。”（民国元年九月五日）

“君于戏剧，与我同一为少有经验；然观君之评剧，……即我未聆此曲，未睹此剧之人之意，与君亦有同意。可知剧固无所谓佳不佳，惟近情者乃佳耳！余尝听人谈剧，而知剧中固多不近情者。彼演剧者亦同是人，何以乃作不近情之剧也？余与君之所见，余常以为近情；苟献身舞台，或亦不失为名伶也。”（民国元年九月七日）

后来他到了甬直，提议在学校里造了一个戏台，自编了剧本，每逢星期三演作一次，这事的伏脉就在那时了。

他家境很清贫，使他不能专向文艺方面走。他中学毕业后，就在苏州城里充做初等小学的教师。他的性情，原是和小学生聚得下淘的，无奈学生以外的人逼着他失掉了职业上的兴趣，所以他觉得很苦。他写信给我道：

“做教师之无味，不在学生之不好，乃在同事之讲不落言话，调查视学之‘像煞有介事’。坐是二者，我乃一肚皮的不高兴！”（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又道：

“昨倚栏干观鞋匠之工作，一刹那间，感想潮涌：以为以正当之腕力，做正当之事业，及其成功，当有无限快乐。所谓正当，系指实际而言；世间之伦理思想之所云，则非我所指也。如彼鞋匠，我力能以为鞋，则别无他之假借，他之思虑，抽其麻丝，持其皮刀为之不已；一鞋告成，此时之乐为何如哉！与我相较，则我必始托人引荐；得业矣，又必规规于课程；修身也，必有崇拜；同事也，必作寒暄；省县视学来，又必受牵制：百不自由。

‘因’既非正当，何得有正当之‘果’！视彼制鞋人，美之不已，效之无才，复自叹耳！……”

（民国二年一月十一日）

那时候，圣陶精神上苦痛极了；他自己文艺上的才具既不能发展，教育上的意见又不能见实诸行；称他的心，实要丢掉了教师，投身做工匠去。果然到后来，为了和同事视学不能沆瀣一气，于民国三年的秋间，给他们排挤去了！

圣陶想象的丰富，描写的精细，自中学时期以至民国三年，都可在他的诗里寻出。他欢喜逢人就侦察他们的心理，代他们设想，这在他给我的信上也可见到几条。那时他虽未作小说，然而做小说的动机与兴味即在于此了。他说：

“日坐茶寮，同学辈刺刺谈政党内阁不休。……一入政党便富于感情；某某党三字之于人，何其有如许神通也！然于广座之中，默聆各人之言论，即可以侦知其隶何党籍。小试侦探术，亦一消遣法已。”（民国二年五月十日）

“看上海各报，……虽明知其为肚里新闻，自撰专电，荒唐论说，而我辈看他如何想法撰法，则亦未始非趣事。”（民国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独至鹤园，茗于携鹤草堂，乃得少舒其意志。修发少年，傍镜自窥其首；盛妆佳丽，逢人故正其眸；热客谈时，涎珠飞越；老翁说古，意态横生：我从旁静观，皆具妙相。”

（民国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假使他早作了几年的小说，这种“政党热”和“园游兴致”——民国元二年间苏州特盛的娱乐，——必然充做了他笔下的材料了。

圣陶与小说最早的因缘，大约是中学校里把伊尔文《见闻杂记》做英文课本。那时，他读了几篇《妻》和《大梦》，便去练习翻译。到后来，又读了些旧小说，报纸上的小说也很留意。当时作者以苏曼殊的笔致为最干净，所以他的《断鸿零雁记》等，圣陶每从《太平洋报》上抄录下来。他刚任小学教员时，酷想把自己的环境和心神作一部很长的自传，前后写了二万字；但教科太忙，不曾作完。元年暑假里，有一家报馆向他要稿子，他想用白话体作一种理想小说，名唤《世界》，所说乃无国界无金钱以后之世界；拟逐日写千余字，一百天左右登完。但那家报馆筹办了长久，转瞬开学，他也不能做了。直到三年秋间受挤去职之后，他方始有了闲暇，努力发展。所苦的，他受经济的逼迫更厉害了，他只得作了许多短篇小说投寄《礼拜六》及《新闻报》等。他曾写信给我道：

“如今为金钱计，日节一二小时为出卖之文，凡可以得酬的皆寄之。……然为文而至此，亦无赖之尤者矣！”（民国三年九月二十日）

“吾今弄些零用，还必勉强写几句。然吾却亦自定宗旨：不作言情体，不打诳语；虽不免装点附会，而要有其本事，庶合于街谈巷议之伦。……总之，吾有一语誓之君前曰，吾决非愿为文丐者也！”（民国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读此，可见圣陶极不愿拿文艺来敷衍生计。他不肯打诳语，必要有其本事，便可知道他的宗旨在写实，不在虚构，和那时盛行的艳情滑稽各派是合不拢来的。

圣陶因为自己所抱的宗旨与时流不合，所以对于当时的小说界很抱悲观。他在三年冬间，曾作了一篇《正小说》，把流行文字批评一下。这篇文章，他做好了就寄到一家杂志里去，我没有看见。现在抄出他来信的数则做个代表：

“近来小说……皆一丘之貉。出场总有一段写景文字：月如何也，云如何也。云月之情万殊，诗人兴咏，灵心独运；而今之小说中所描写之云月乃无弗同！其语句：如谓女才则曰‘诵唐诗琅琅上口，此某家不栉进士。’《聊斋志异》中，此等语虽非常见，然统观全书，亦且厌其老调；今乃无篇不然矣！公园春游，男女邂逅，三语未终，便是求婚。其后非阻于父母，即梗于离乱；中间约略点缀几句伤离怨别之套语，便自诩极文字之波澜，尽言情之能事矣！今世风行，言情独盛；言情之作，尤多老调：夫岂作者读者均弗怪为老调耶？抑亦人心